前　言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近邻。中国亦称“赤县”，日本又称“扶桑”。扶桑本为一种花色艳丽、十分好看的观赏灌木，以扶桑喻日本，乃是一种赞美。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就保持着从未间断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文化之缘”长期把两国维系在一起，共同创造着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为世界的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两国人民一向以勤劳、聪慧和勇敢而著称于世。姑且不提远古的传说时代，仅就有文字记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就已有二千多年了，真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岁月中，两国人民通过各种交往和交流，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友谊。勿庸讳言，在古代历史上，中日两国也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总的说来，在古代，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互相促进是主流。到了近代，形势发生逆转，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很快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紧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后尘，相继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和 20 世纪 30～40 年代进行的全面、残酷的侵华战争。这一切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尽管如此，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也没有停止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上古时代，突出表现为历时久，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这种文化交流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光辉夺目。其中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仅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说，这种交流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涵盖面极广，其中主要有文字、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法律、伦理、道德、建筑、科技、园林、美术绘画、音乐、舞蹈、戏剧、书法、医药、文献典籍、体育、武术、工艺、雕塑、饮食和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1972 年中日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揭开了中日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1978 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可靠保障，也是对亚洲和世界永久和平和稳定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所编撰的这本小册子，简要地回顾了从远古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期间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重温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些人和事。其目的就是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增强彼此的团结和互助，教育子孙后代珍惜往昔的历史遗产，并以史为鉴，警惕有人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脱罪责，让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携手并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像长江、黄河和信浓川一样，日夜奔流，永不停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翻阅了原始资料外，还吸取了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他们整理和引用的资料以及他们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丛书”的篇幅所限，不能明确地一一指出，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地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故书稿中谬误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冯佐哲　　1994 年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一衣带水的近邻

1. 西太平洋上的岛国及其远古居民

中国与日本同处在世界的东方，即所谓远东地区，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日本远离大陆，是孤悬于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列岛国家，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和四国等 4 个大岛和约 3900 个小岛组成。它的地形很像一张细长的弯弓，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着，总长 3800 公里左右，面积 378000 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不到 3%，约为中国的 1/25。其中山地、丘陵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 75% 左右，其上布满茂密的森林，占山区总面积的 65%。最高的山叫富士山，海拔 3776 米。最著名的山脉还有日本阿尔卑斯山脉。河流多短小湍急，故水力资源丰富，而不利于航行，最长的河流叫信浓川，全长 367 公里。在日本各地布满了活火山和温泉，是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的一部分。日本地处北温带，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雨量 1800 毫米左右。这种气候对农业，特别是水稻的生产非常有利。日本四面临海，鱼类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捕鱼国之一。日本矿业资源不太丰富，只有一些煤、铜、铝

等矿产，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需求。

据 1994 年日本外务省公布，日本全国人口数为 1 亿 2 千 3 百万人，居世界第 7 位，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76％以上，大约每平方公里居住着 332 人，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全国人口中，除北海道有少数土著的阿伊努族（又称虾夷族）之外，几乎全部是大和民族。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近邻，两国隔着日本海、东海和黄海彼此相望，两国大陆最近处仅相距四五百海里，如日本九州的长崎与中国的上海相距 460 海里，日本南端的先岛群岛同中国的台湾相隔仅 60 多海里，故往来便利。即使在古代交通工具相对落后的岁月，中日两国人民早在远古时期就利用日本海流和朝鲜半岛以及对马海峡中一些星罗棋布的岛屿（如对马岛、壹岐岛等），进行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到了唐宋之际，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如罗盘的广泛使用等），从而扩大了航线。除了以往从九州渡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至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海岸航行的航线外，又在两国相距最近的长江口、钱塘江口到九州北部一线上形成了新的航线，这样就使中日间的交往更为便捷、更加频繁了。

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多年来的考察和研究证明，在远古时代（即中生代），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是联结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在日本列岛上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存与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中原大地旧石器文化遗存有着许多共同点就可以得到印证。据说大约在 30 万年至 1 万年前，即新生代第 4 纪更新世时，当海面因冰川期来临，日本列岛有几次通过陆桥与亚洲大陆相连，后来在 1 万年前的全新世初期，由于第 4 纪一次冰川期结束，气温变暖、海水上升和地壳的变动，日本列岛才最后脱离了大陆，孤悬于西太平洋之中。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结束了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 300 年以前日本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除发现了大量磨制石器外，还发现了不少手制黑色陶器。因其外部布满了草绳式的花纹，故人们又称其为绳纹式陶器，因此在日本历史上称这个时代为“绳纹文化时代”。

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来看，当时日本还处在原始公社制社会。人们多住在沿海地区，以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经常使用的工具是石斧、石镞和石投枪等，并且已使用兽骨制成的钩针和原始的鱼网捕鱼。

从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200 年左右，日本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此时金石并用，但青铜器很少，且多是从中国、朝鲜地区传入的，主要是青铜镜和青铜剑等祭祀用具。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主要是石斧、石镰和石锄等。陶器是用陶钧生产的一种褐色陶器，其外形比较光亮，被称为弥生式陶器（因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故而得名）。因此日本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

“弥生文化时代”。此时日本人口增加，贫富开始分化。人们多以农耕为业，兼顾渔猎和采集。在九州和本州的一些地区，人们已开始用铜器和玉器殉葬，氏族首领开始占据剩余财富并具有某些宗教特权，这一切均标志着日本的原始社会开始走向崩溃。

2. 秦汉以前中日间的接触与航线

上古时期的先民们很早就知道利用海流进行渡航，加强接触。从菲律宾一带海域北上的黑潮暖流，流至日本奄美大岛西北方时，分为两支，一支流达对马海峡，继续向北流入日本海，与发源于鞑靼海峡（又名间宫海峡）南流的里曼寒流相遇，双方撞击后，一部分转而向东，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一支支大小股支流而渐渐削弱，最后流至库页岛西岸而消失。这就是沿着日本列岛的左旋环流。先民们就是利用这一环流，驾驶小舟从朝鲜半岛东南部沿海顺流抵达日本本州的山阴道和北陆道地区。但是这只是一条原始的自然航路，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半漂流性的单线航路。

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先民们克服各种困难，开辟了一条横渡从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经对马海峡、朝鲜海峡的海北道新航线，这就大大便利了人们的交往和文化交流。

通过这些航线，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和物质文

明源源不断地传入了日本列岛。例如发源于我国南方的水稻和稻作技术就是距今 2500 多年前（即中国春秋时代末期）传入日本九州一带的。这是由考古学家在九州发掘的一些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稻粒和水田遗迹得到证实的。同时日本列岛的旱地耕作也与大陆农耕有着密切联系。如大分县大石绳纹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与中国华北地区的同类工具相似。中国的青铜器在先秦时期已传入日本西部地区。如本州中部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山阴道、北陆和近畿一带发现了许多铜铎，在本州东南部和四国地区也发现了形大体薄、经日本人改铸的新式铜铎，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铜铎及其制造技术较早通过日本海海流航线先传到山阴、北陆地区，然后又经此传入其他地区的；日本人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仿制和改造，从而创造出了日本式的铜铎。此外，考古学者还在对马岛、北九州以及近畿地区发现了不少铜剑、铜戈、铜镜和铜铎等器物，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海北道新航线由大陆传入的，当然也有的是在本地仿造的。此外，在本州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还出土了一些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钱币——“明刀”、秦代前期的“安阳方足币”和王莽时代的“货泉”等，反映了秦汉时代中日贸易的发展水平。

关于中日两国早期往来的历史，在中国典籍中也有记载。例如在（山海经）中就写道：“盖国在巨燕南、倭北， 倭属燕。”这里所说的“盖国”在

朝鲜半岛的盖马山之东，即汉代玄菟郡以西的盖马县；“巨燕”意为“大燕”，即中国北方山古燕国；“倭”即日本的古称，在朝鲜半岛之南。当时倭国被视为属于燕国。《山海经》可以说是一部研究古代地理的典籍，成书较早，其中主要反映了周与春秋时代的一些情况。以上记述，说明早在先秦时代，中日两国先民已通过朝鲜半岛频繁往来，进行物质、文化交流。此外，在汉代学者王充所著的《论衡》一书中，也提到在周成王时有倭国人贡献香草的故事。这些文献都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早期交往的史实。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征战不已，为避免兵祸战乱，中国北方的燕、赵、韩和齐等国的人民有不少逃难到朝鲜半岛，有的人进而还从这里渡海到日本列岛，在那里定居和繁衍，成为日本居民的祖先的一支，这就是日本史学家们所说的“铜铎民族”、“出云民族”和“无降民族”。由此可见，早在日本史前时期，即中国的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中日两国人民就已有着密切的交往。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就已经传到日本，但是这种交流是自发的，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二、秦汉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1. 有关徐福东渡的传说

公元前 3 世纪末至公元 3 世纪初的大约 400 余年间，是中国的秦汉时代，当时中国已经是一个封建统一的东方大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在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周边各国都有巨大影响。当时日本已从绳纹文化时代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原始公社制社会已渐渐瓦解，许多部落小国彼此并列，不时与中国、朝鲜等国往来。此时又有不少中国人或为了躲避战乱，或为了摆脱当权者的残暴统治，取道朝鲜半岛渡海到了日本列岛。他们不但带去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而且带去了大陆的先进文化，这一切都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当政期间，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他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修建了驰道，并积极扩大领土，经营边疆各地，特别注意对沿海地区的开发。他曾多次到各地巡游，并 4 次巡海，先后到过辽东、山东和东南沿海等地区。当时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置了不

少造船工场，能制造较大型的木帆船，甚至楼船。当时沿海地区，特别是渤海、黄海地区的居民由于具有航海传统，高超的航海技术及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们经常驾驶着木船往来于沿海各个海岛之间，其中也包括日本列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中日两国的民间，并且在两国的文献记载中一直流传着有关“徐福东渡”的传说。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在秦始皇统治时期，齐国（大致相当今山东一带）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史记》中为徐市，古时“市”音 fèi），他为了迎合秦始皇想长生不死、永作皇帝的心理，上书说东海中有三座神仙居住的仙岛，名叫蓬莱、方丈和瀛洲，长满了长生不老的“仙草”，他愿意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去寻找这种仙药，采回来献给皇帝，以表忠心。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派 3 千童男、童女，乘 85 只大船出海，后来便到了扶桑国（即今日本国）。他们从此再没有回来，并彼此通婚，繁衍后代，成了今天日本人的祖先。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徐福一行果真到了日本吗？徐福其人其事到底如何？他为什么出海东渡？这一切很久以来就是学术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目前在研究徐福其人其事以及他是否到过日本的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观点：①肯定论。他们认为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他率领的一部分中国人确实东渡到了日本。②否定论。他们认为有关徐福的事迹全系虚构，徐福只是一位传说中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物。③存疑论。他们认为在新史料、新遗物发现之前，只能存疑，不能简单确定有无。 ④牵强论。他们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⑤未到日本论。他们认为历史上徐福其人、其事确实存在，不容怀疑，但对于他浮海东渡到日本，却持否定态度。⑥移民代表论。他们认为不管徐福是否到过日本，至少可以证明徐福是中国移民的代表，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中一位象征性的人物，其意义重要而深远。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不仅在中日两国的文献中均有记述，而且在两国的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有关他的“遗迹”。例如，在中国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有“徐乡”，琅琊（今胶南市）、诸城、即墨一带有“徐福岛”、徐福旧庙、“秦山岛”等，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有“徐阜（福）村”等。日本九州佐贺市的“金立神社”，相传就是为了奉祀徐福而修建的，当地人称他为“金立先生”。传说当年徐福一行就是从佐贺伊万里港登陆的，并在附近的金立山住过一段时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徐福登上金立山、遥望西方、怀念大陆故乡，以及后来他与当地酋长名叫阿辰的女儿恋爱的故事。佐贺地方的居民每隔 50 年就要举行一次“徐福大祭”，届时人们头扎彩带，手提灯笼，有的还穿着印有汉字“徐福”的和服，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这种活动有时也和“求雨”结合在一起举行。在日本的传说中，徐福又从九州继续北上，经过博多湾、濑户内海，

到达纪伊半岛的和歌山和近畿地区，故这一带至今还有不少与他有关的遗迹和传说。例如，据说三重县熊野市附近的矢贺海岸（亦称熊野浦）就是徐福一行登上本州的地点，其地也有徐福坟、徐福丘和徐福宫等。又在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町有徐福祠、徐福墓（墓碑上刻着“秦徐福之墓”几个大字）以及徐福 7 个主要随从的坟墓。新宫市附近的一座山被称为“蓬莱山”，据说徐福等人就在此山采集过长生不老仙药，至今每年 9 月 1 日当地居民还要举行盛大的“徐福祭”。此外，静冈县富士山地区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说是徐福一行在富士山（日本人也称此山为“蓬莱山”）上果真采集到了长生不老之药，可是此时秦始皇已经命丧黄泉，于是他便留在了该地，教当地居民农耕、养蚕、医学、纺织、冶金、捕鱼等（富士山附近的山梨县浅见神社还把徐福奉为纺织神），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最后终老在这里。据说他死后化作为一只仙鹤，经常在富士山麓盘旋，表达了他对日本的眷恋之情。所以在富士山周围也有几座徐福祠。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散布在日本各地有关徐福的遗迹总共有 56 处之多。

当然，传说不一定等于历史，但它至少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也反映了日本人民对徐福以及早期中国移民们的怀恋与纪念。总之，不管徐福到没到过日本，他都是早期中国移民的象征和代表，反映了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左右，确有大批中国移民（日本

历史中称其为“渡来民”），为逃避战乱和秦始皇的暴政而远走异乡，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来到日本列岛定居繁衍，并传播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生产工具、技术等，从而使日本绳纹文化时代的落后生产力发生了飞跃和突变，进入了弥生文化时代。这一点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么有关徐福东渡日本的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根据中国典籍进行一番探讨。笔者认为徐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徐福，字君房，齐国琅琊人，秦代方士，大约生于齐王建十年（公元前225年）。据徐氏后人徐定安所著《徐氏历代名人录》记载，其族先祖为伯益之子若木，因被封在徐地，故以徐为姓。若木第32代孙名诞，在周穆王时因功被封为徐偃王。他的第29代孙名议，又名叫“市”，字彦福，这便是徐福。有关徐福东渡的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据其中所记，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到了齐国琅琊，齐人徐福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有神仙居住，他要求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徐福等入海数年没有得到“神药”。他害怕受到始皇惩处，故撒谎说：蓬莱山确实有长生不老之药，但此处有“大鲛鱼”干扰，不易靠近，请求始皇派善射的射手一同前往，如遇到大鲛鱼好把其射死……于是始皇又给他派了射手和工匠，并送给他许多五谷种子。这次徐福入海到了一处“平原广泽”

之地，自立为王，就再也没回来了。这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指出徐福一行到了日本。其后在魏晋时陈寿所著（三国志）一书中也提到徐福东渡一事。书中说徐福到了东海“亶州”。这里所说的亶州到底是什么地方，现在还不能确定下来，是否是日本更不可考。到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等人在诗中也曾提到徐福东渡之事，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指出徐福确实到了什么地方。在中国史籍中最早明确指出徐福到了日本的，是五代时后周开元寺义楚和尚所著的《六帖》一书“国城州市部”中提到的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渡海东去日本。书中说该国有山名叫“富士山”，又叫“蓬莱山”，并说在日本有秦氏一族，皆为徐福的后代。唐宋以后，至元明清各代，记载徐福到达日本的书籍日渐增多，并均明确指出徐福一行到了日本。例如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一诗中就有描述：

昆夷道远不复通，传世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沦海东。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兆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从此诗可以看出徐福确实到了日本，并且还带去了百工、五谷等。最令人注目的，是说徐福临行

时还带去大批的中国文献典籍，其中有不少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已被烧光了，因此有些“逸书”只有在日本还保存着，所以弥足珍贵。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日本有一位名叫绝海中津的和尚渡海来华，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接见了他，两人赋诗唱和，在诗中他们都谈到了徐福东渡之事，现抄录如下：

绝海中津的《应制赋三山》一诗为：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如风须早归。

朱元璋的《御制赐和一首》诗为：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昔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

在清人的著述中也不乏有关徐福事迹的记载，如曾任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所著《日本杂事诗》中就曾有一首诗谈及此事，原文如下：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
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

近年来有关徐福事迹的研究，随着中日友好的呼声日高而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有关徐福研究的著述、小说和戏剧不断问世，各种研究会相继成立，标志着徐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汉朝与日本交往的物证——“金印”

从现存文献来看，中国和日本交往最直接、最明确的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中写道：在乐浪海（即朝鲜半岛附近的海洋）中有“倭人”居住，当时分为百余个小国，经常派使节到中国来朝贡的就有 30 余国，它们都得到了中国的回赐。这说明在汉朝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已从民间的交流，进入了有目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也可从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到近畿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的铜镜、璧玉和钱币等文物得到证明。汉代两国的交往比前代更加密切和频繁了，特别是在东汉时期，中日互派使节的次数比以往更加多了。例如在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记载说：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派使臣带着贡品到中国洛阳来朝贺。使臣自称是“大夫”。此人是倭国中最南部的一个国家的使臣，光武帝接见了他，并赐该国印绶。到了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倭国王帅生以 160 多个奴隶为贡品来中国朝贡。

如前所述，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由于受到中国和朝鲜等国先进文化的影响，已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金石并用的时代。在日本列岛的中西部地区，原始社会已经崩溃，进入了奴隶社会，产生了部族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朝鲜的交往甚为密切，不时派使节带着贡品到中国朝贡。这些史实绝非凭空杜撰，而是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其中最著名的是 18 世纪中叶在日本发现的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金印。关于“金印”的出土，还有一段生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